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下的金融监管研究进展

张黎明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作为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标准,对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巴塞尔协议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审慎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及流动性监管方面。本文收集整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监管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重点归纳了最近五年的代表性观点,以期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 宏观审慎监管; 资本充足率监管; 流动性监管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685(2019)11-0122-07

DOI: 10.16528/j.cnki.22-1054/f.20191112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创,巴塞尔委员会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刻反思,于2010年底发布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后经一系列改革与修订,在2017年12月发布《巴塞尔Ⅲ: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简称巴塞尔Ⅲ。由于巴塞尔Ⅲ形成过程中的验证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部分发达国家,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巴塞尔成员国的适用性及影响有待进一步考量,这就成为危机后各国学者研究的焦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巴塞尔Ⅲ下的金融监管进行大量研究,主要涵盖宏观审慎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及流动性监管等方面内容,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各国实施巴塞尔Ⅲ过程中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因此,本文重点归纳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近五年学术界关于巴塞尔Ⅲ监管方面的代表性观点,以期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宏观审慎监管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将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方向由微观审慎监管转向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 宏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协同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多项研究发现,如果只采用货币政策系列工具,忽略宏观审慎监管相关工具的作用来调节信贷规模,需要较大幅度调整利率才可达到预期目标,而利率的大幅波动又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因为流动性监管的目标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为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银行业必然会调整其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期限结构的改变又会进一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缓和利率调整幅度。^[1] 博里奥(Borio)以资本监管、货币政策、商业周期和传导机制之间相互作用为出发点,结合金融体系的演变,对传导机制的特点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彼时的宏观经济范式和相关模型无法解释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即货币政策与经济主体对风险的感知和定价之间的联系),降低了风险

作者简介:张黎明,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承担渠道作为货币政策指南的有效性,但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体系的周期性调整提升了风险承担渠道的重要性。^[2]阿曼达·福吉 (Armand Fouejieu) 指出中央银行应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寻求平衡,通过利率调节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同时通过补充有效的宏观审慎工具来应对金融风险。^[3]徐长生和艾希的研究表明,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或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有限,无法同时实现稳金融防风险和促进信贷增长两个目标,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配合货币政策协调使用,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4]

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执行国货币政策的协调程度,鲁比奥 (Rubio) 等利用住房市场、银行、借款者和储蓄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 对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与货币政策间的相关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资本需求比率增加时,货币政策需要更加激进,但这种政策组合带来了一个更加稳定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组合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带来了稳定的金融环境。^[5]郑兰祥等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 (GMM) 对我国宏观审慎监管进行有效性检验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比较复杂,政策组合除相互补充协调外,“政策抵消”和“政策超调”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宏观审慎政策弥补货币政策缺陷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6]在此基础上,徐海霞等运用带有抵押品约束的 DSGE 模型分析如何协调宏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才能更好地调节经济周期、改善社会福利和稳定金融发展,结果发现,经济体在需求和供给两个不同的层面,两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是不一致的。^[7]

(二)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研究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选用是进行有效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前提,对此,各国学者通过研究分别给出建议。徐尚元 (Suh) 对相关违约模型进行扩展,提出一个包含条件异方差特征的可观测共同因素的系统风险度量模型,并将这一模型应用于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研究表明,共同因素可作为解释资产收益率和衡量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工具。^[8]曼德卡 (Mendonça) 等认为,信贷风险和资本缓冲是衡量金融稳定的重要指标,央行发布的信贷市场预测信息可以减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关于信贷发展的沟通方式可能成为改善金融稳定的重要宏观审慎工具。^[9]刘超等的研究表明,微观审慎监管中不良贷款率长期显著的影响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稳定性,宏观审慎监管中,银行业集中度和偏离度 (广义信贷/GDP) 这两个监管指标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都较为明显且长期存在。^[10]

(三) 宏观审慎监管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研究

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宏观审慎监管效果会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中,部分监管指标暴露出严重的顺周期性,即在某种经济环境下不仅未达到监管者的预期目标,反而加速金融危机恶化,因此,危机后对于逆周期监管及其测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巴塞尔Ⅲ中对逆周期调整指标的选择主要参考信贷/GDP比率及信贷/GDP缺口(信贷/GDP比率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值),针对以上指标是否能有效指导逆周期缓冲资本的计提学术界存在两种声音。如,德尔曼 (Drehmann) 等以全球64个国家的46次危机为研究对象,利用信号提取法研究指标的预警作用,结果表明,信贷/GDP和GAP可在较大程度上预测金融危机,因此GAP可作为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指标;^[11]但艾吉 (Edge) 研究发现,事后修正的美国信贷与GDP比率与未修正前差距几乎等同于缺口本身,样本区间长度、如何计算长期趋势值,以及选取的参数平滑因子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GAP的计算结果,因此GAP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导致逆周期监管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12]

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周期的作用机制方面,胡利琴等通过脉冲响应和福利损失函数分布探究宏观审慎监管发现,如果宏观审慎政策运行过程中,仅仅抓住信贷增速和资产价格两个因素,该政策可以最大程度熨平经济波动。^[13]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货币信贷处课题组等分析指出,宏观审慎评估在金融周期的收缩阶段释放一定的资本缓冲,可给予金融机构一定“宽松”的信用创造环境,但经济下行及金融在上一轮经济繁荣阶段的扩张带来的“过度透支”与内生性信用创造受损而导致的经济金融周期“双

紧缩” ,可能导致逆周期调节“失效” ,最终影响政策目标实现。^[14]

二、资本充足率监管研究

资本充足率作为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金融监管中始终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目前学术界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 资本充足率水平与货币政策相关性研究

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莫赖斯(Moraes) 等通过分析巴西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间的联系发现 ,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将改变贷款投放量和资本充足率水平。^[15]在此基础上 ,尼古拉(Nicolay) 等通过研究巴西如何协调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影响银行维持的资本缓冲 ,发现: 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变化做出强烈反应 ,在利率上升(下降) 情况下增加(减少) 资本缓冲; 银行利用资本缓冲来适应新的监管资本措施——宣布限制性资本措施来减少或增加资本缓冲。^[16]不同资本充足率水平下 ,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代里斯(Delis) 等认为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可以有效降低货币政策冲击带来的影响。^[17]阿迪西亚(Adithya) 等采用面板阈值回归模型 ,以印度尼西亚银行集团 2011—2016 年月度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门槛效应 ,同时比较不同资本充足率下货币政策对银行的影响 ,结果表明 ,印尼银行存在资本门槛效应 ,只有当银行拥有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时 ,货币政策才能有效发挥控制银行风险的作用 ,另外高资本化银行更易受货币政策的影响。^[18]其他方面 ,布鲁诺(Bruno) 等指出 ,杠杆率调整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关键 ,货币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和美元汇率升值通过银行业产生溢出效应 ,当货币政策受到紧缩性冲击时 ,跨境资本流动减少同时银行杠杆率下降。^[19]

(二) 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相关性研究

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并且银行的属性也决定了银行承担风险能力的大小。吉达拉(Guidara) 等认为 ,资本缓冲较高的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低于资本缓冲较少的银行。^[20]阿纳姆(Alam)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 模型计算技术效率分数 ,同时利用不相关回归方法(SUR) 计算银行监管与风险评估间的同时性 ,研究表明 ,严格监管操作提高了监管权力 ,同时提高了伊斯兰银行的技术效率 ,更高的资本监管导致伊斯兰银行风险承担较少。^[21]李树生等通过对 216 家中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信贷风险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而在非上市商业银行间不存在这一关系 ,银行异质性导致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敏感性存在差异。^[22]冯传奇和洪正利用 2004—2015 年我国 130 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 ,采用 GMM 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微观特征与风险承担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 U 型关系 ,资本充足率越高、存贷比越低的银行 ,其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 ,高资本充足率、低存贷比对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会减弱 ,进而提出监管机构应警惕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银行业风险加剧 ,根据银行不同微观特征构建更为有效的监管指标体系。^[23]引入杠杆率的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缓释效应也有异质性 ,如 ,张庆军等通过对 96 家商业银行经营数据研究发现 ,随着杠杆率监管的引入 ,银行增大了对自有资本的持有比例 ,降低了风险承担程度 ,提高了稳定性。此外 ,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缓释效应存在异质性 ,并且其对银行的风险缓释作用在银行资产质量较差时更显著。同时 ,也会给资产质量较好但杠杆率指标不达标的银行带来监管方面的压力。^[24]但应区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是银行的主动行为还是监管硬性要求 ,如果是银行主动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那么银行将承担较低的风险 ,但如果是监管硬约束 ,则银行更多情况下是增加监管资本而非降低风险 ,同时资本监管硬约束也引发了与监管相关的银行套利行为 ,此行为加大了银行面临的风险。如 ,赵静等基于中国 55 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分析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 ,结果表明 ,银行尤其是非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套利行为比较严重 ,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显著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能力 ,但杠杆率显著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能力。^[25]钟永红等选取国内 40 家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商业银行作

为研究样本,检验资本监管硬约束对银行资本、风险和绩效调整的短期效果。结果表明,银行通过增加资本量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导致资本监管并不能切实发挥缓解银行风险的作用,因此资本量较多的银行有更强的风险承担激励。^[26]冯文芳等利用动态面板,从资本监管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发现如果在资本监管指标中引入杠杆率约束,将有利于增加银行的资本量,降低银行业的风险水平。此外,银行若通过补充资本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将导致银行的资本压力增加,而资本压力的上升又会刺激银行监管套利,即资本补充压力越大,银行监管套利动机就越强。^[27]

在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稳定性关系方面,博里奥(Borio)认为资本缓冲是金融稳定管理的主要宏观工具。^[28]马广奇等采用微观层面的数据标准化方法(Z-Score)衡量银行稳健性,通过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资本充足率及相关监管指标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并指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稳健性之间是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在不同资本充足率状态下,该指标将对银行稳健性产生正反方向两种影响效果。^[29]此外,彭建刚等指出,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加刚性杠杆率监管存在机理性缺陷,应引入弹性杠杆率缓冲,刚性杠杆率监管加弹性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机理性缺陷就可避免,杠杆率的弹性化程度与银行系统重要性程度也相对应。^[30]国际金融学会(IIF)认为,巴塞尔委员会严重低估了资本监管对经济的影响,按照当时资本充足率要求,若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每提高1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将上升65个基点,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的提升使2011—2015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产出损失高达3.1%。^[31]

(三) 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陈汉文等从16家上市银行风险管理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发现在资本充足率显著优于监管部门最低标准的银行样本中,降低资本充足率的途径之一是提高银行的内部控制水平。^[32]Suh利用多家银行模型引出银行违约资产相关性对银行资本监管的宏观审慎意义,研究表明,如果银行破产表现出规模资产的社会成本增加,银行最优资本水平将随银行间资产相关性的增强而提高。^[33]

三、流动性风险监管研究

流动性风险通常作为金融危机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受到各国监管机构的广泛关注,一方面,为防范化解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机构要求金融机构需持有较高比例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资产以应对偿付危机,监管要求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了银行的稳健性;另一方面,长期持有较高比例优质流动性资产将大幅增加银行为应对监管压力所需支付的成本,对银行经营绩效及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于流动性风险监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 流动性风险监管对金融稳定的积极影响

部分学者认为,流动性风险监管对金融稳定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关于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对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黛德丽(Dietrich)等以1996—2010年欧洲7国921家银行15年的数据为样本,计算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结果表明,如果NSFR较高,短期内银行面临的成本压力较大,但长期看,成本压力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银行盈利水平的下降。^[34]潘敏等研究发现,NSFR越高,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就越低,并且中国商业银行存在一个实现银行绩效最大化的NSFR水平。^[35]关于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刘志洋以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发现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水平受流动性比率指标的显著影响,其与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的结合能有效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提出我国在推动巴塞尔Ⅲ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对其实效性的验证,不断优化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36]唐齐鸣等利用中国53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银行NSFR对风险的影响和融资流动性与风险承担的关系,认为短期流动性风险较低的银行风险承担较大,但NSFR监管通常限制银行在资金流动性风险较低时承担更多风险,且NSFR对区域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更显著,应针对不同类型银行采取差异性的流动性监管

措施。^[37]梁枫通过构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与金融安全性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两者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流动性风险监管与金融安全性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促进关系,提出应从强化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建立动态流动性风险逆周期监管机制和适度扩大流动性风险监管范围三方面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进行监管。^[38]

(二) 流动性风险监管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

由于巴塞尔Ⅲ中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要求较为严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执行国的金融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一方面,部分国家实施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难度较大,黛德丽(Dietrich)运用欧洲银行数据研究认为,由于巴塞尔资本协议Ⅲ规定的NSFR100%的最低要求较高,大部分银行都难以达到要求,尤其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并快速增长的银行来说,其NSFR水平相对更低,达标的难度更大。^[39]同时,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实施会降低银行的息差水平、增加企业融资难度。艾伦(Allen)等研究发现,巴塞尔Ⅲ流动性风险监管会在较短时间内对企业信贷可获得性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40]米歇尔·金(Michale R. King)采用15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NSFR100%的最低要求会使银行的净息差减少40%。^[41]陈颖等对美国134家具备时间连续性的商业银行的NSFR进行测算,并指出宏观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及银行自身的类型、规模和资本比率都影响银行的净稳定融资比率,这些因素也会给商业银行利润水平带来一定程度负向影响。^[42]此外,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如安吉利尼(Angelini)等研究发现,巴塞尔Ⅲ流动性风险监管协议中的NSFR指标实施会使经济增长出现下滑,NSFR每增加1%会使经济产出下降0.08%。^[43]

(三) 货币政策与银行流动性

货币政策的类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的流动性水平,同时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变化将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两者可以形成互补。庞晓波等基于87家银行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净稳定资金比例在流动性风险监管中作用,发现净稳定资金比率超过107.9%时,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比例对利率的敏感性下降。^[44]此外,哈凯琴尔(Hackethal)认为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会受到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规模、银行风险水平等因素制约。^[45]但需注意区分货币政策对流动性在正常时期和金融危机时期的不同影响,如贝格尔(Berger)运用美国1984—2008年银行业数据论证商业银行行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分别识别了正常和危机两类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只有在正常时期才会影响小型银行的流动性,且小型银行通过开展表内业务增加流动性在货币政策较为宽松时更便捷,而这种效应对大中型银行影响并不显著;但金融危机时期,无论对于何种规模商业银行,货币政策对流动性风险的效应都将减小。^[46]其他方面,刘文栋等通过动态面板模型,以134家银行为例,探究资本监管、经济周期和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发现银行流动性风险具有顺周期性,大型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顺周期性较城市商业银行更为严重,监管者应通过加强逆周期监管减缓顺周期性,不应盲目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等方式提高银行的流动性风险。^[47]

四、主要结论及评述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巴塞尔协议Ⅲ下的金融监管研究从宏观审慎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流动性风险监管等方面展开,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采用何种互补机制才能更有效发挥防范风险的作用;虽然通过控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面临的不稳定性,但通过增加资本量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对降低银行风险没有作用,资本充足率相关机制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缺乏对货币政策实施细节的探讨。

综上,今后需在以下方面深入研究:一是如何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促使两者相互配合,进而在有效实现宏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发挥货币政策最大效能。二是如何确定最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以期实现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有效控制。三是如何实现在流动性风险较高的背景下,通过对

流动性监管政策的有效实施提升货币政策对流动性风险的应对能力。四是如何发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及流动性监管四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机制,实现金融监管的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 [1] IMF. Lessons for Monetary Policy from Asset Price Fluctuations[R]. Word Economic Outlook 2009.
- [2] Borio, C, Zhu, H. . Capital Regulation , Risk – taking and Monetary Policy: A Missing Link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2 (4) : 238 – 251.
- [3] Armand Fouejieu ,Alexandra Popescu ,Patrick Villieu. Trade – offs between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bjectives[J]. Economic Modelling 2019.
- [4] 徐长生,艾 希.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基于中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6) : 39 – 47 + 255.
- [5] Rubio M. , José A. Carrasco – Gallego. The New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Basel III and Monetary Policy: A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 2016(26) : 294 – 305.
- [6] 郑兰祥,王 敏.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有效性及其 GMM 方法检验[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9(1) : 81 – 91.
- [7] 徐海霞,吕守军. 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效应研究[J]. 财贸经济 2019 (3) : 53 – 67.
- [8] Sangwon Suh. Measuring Systemic Risk: A Factor – augmented Correlated Default Approach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2 (2) : 341 – 358.
- [9] Helder Ferreira de Mendonça ,Laudio Oliverira de Moraes. Central Bank Disclosure as A Macroprudential Tool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J]. Economic Systems 2018(42) : 625 – 636.
- [10] 刘 超,马玉洁. 商业银行宏微观审慎监管协调性研究——基于 P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J]. 商业研究 2019(4) : 69 – 80.
- [11] Drehmann M, Borio, C. ,Tsatsaronis K. . Anchoring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 The Role of Credit Aggregat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 , 2011(4) : 189 – 240.
- [12] Ochelle M, Edge R. ,Ralf R. Meisenzahl. The Unreliability of Credit – to – GDP Ratio Gaps in Real Time: Implications for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 , 2011(4) : 261 – 298.
- [13] 胡利琴,王安东,常 月. 影子银行、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J].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8(6) : 22 – 35.
- [14]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货币信贷处课题组,王鲁滨,霍 帅. 我国宏观审慎评估(MPA) 的目标实现——基于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与逆周期调节[J]. 西南金融 2019(4) : 3 – 13.
- [15] Moraes J. C. O. ,Montes G. C. ,Antunes J. A. P. . How Does Capital Regulation React to Monetary policy? New Evidence on the Risk – taking Channel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6(56) : 177 – 186.
- [16] Nicolay R. T. F. ,Moraes J. C. O. ,Tiberto B. P. . The Effect of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on the Capital Buffer of Bank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J]. Econometric Research in Finance 2018(3) .
- [17] Delis M. D. ,Kouretas G. P. . Interest Rates and Bank Risk – taking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1(4) : 840 – 855.
- [18] Adithya Prabowo ,Mahjus Ekananda. A Capital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Risk – Taking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2017(4) : 430 – 443.
- [19] Valentina Bruno ,Hyun Song Shin. Capital Flows and the Risk – taking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 2015(3) .
- [20] Guidara A. ,Lai V. S. ,Soumaré J. ,Tchana F. T. . Banks’ Capital Buffer , Risk and Performance in the Canadian Banking System: Impact of Business Cycles and Regulatory Changes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3 (9) : 3373 – 3387.
- [21] Alam N. . Impact of Banking Regulation on Risk and Efficiency in Islamic Banking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ccounting , 2013(11) : 29 – 50.
- [22] 李树生,管衍锋. 资本约束、银行异质性与信贷风险敏感性[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5) : 51 – 60.
- [23] 冯传奇,洪 正. 利率市场化、银行微观特征与风险承担[J]. 商业研究 2018(1) : 62 – 70.
- [24] 张庆君,陈 思. 杠杆率监管引入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缓释效应吗? ——基于中国 96 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3) : 29 – 44.
- [25] 赵 静,王海杰,卢方元. 银行治理视角下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8) : 27 – 35.
- [26] 钟永红,张卫国. 资本监管约束下银行行为调整的动态特征分析[J]. 统计研究 2015(4) : 53 – 63.
- [27] 冯文芳,闫 磊,李 艳,等. 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J]. 华东经济管理 2018(2) : 102 – 108.
- [28] Borio J. . Rediscovering the Macroeconomic Roots of Financial Stability Policy: Journey ,Challenges and a Way Forward [J]. Annual Re-

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 : 87 – 117.

- [29]马广奇,王瑾.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经营稳健性研究[J].征信 2018(10): 58 – 64. ?
- [30]彭建刚,马亚芳.基于《巴塞尔Ⅲ最终方案》的弹性杠杆率监管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79 – 86.
- [31]IIF. The Cumulative Impact on Global Economy of Change in Financial Regulatory Framework [R]. 2011.
- [32]陈汉文,杨增生.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资本充足率——来自我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8(1): 55 – 64.
- [33]Sangwon Suh. Asset Correlation and Bank Capital Regulation: A Macroprudential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9. ?
- [34][39]Dietrich A. ,Hess K. ,Wanzenried G. The Good and Bad News about the New Liquidity Rules of Basel Ⅲ in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4 (6) : 13 – 25.
- [35]潘敏,汪怡,陶宇鸥.净稳定资金比率监管会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和绩效吗——基于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 2016(6): 19 – 28.
- [36]刘志洋.流动性风险监管能够有效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吗——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J].南方金融 2018 (11): 67 – 74.
- [37]唐齐鸣,曹甜.融资流动性、流动性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 53 家银行的实证研究[J].金融与经济 2018(3): 4 – 11.
- [38]梁枫.金融安全视角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路径选择[J].经济问题 2018(7): 39 – 43 + 110.
- [40]Allen B. ,Chan K. K. ,Milne A. ,Thomas S. Basel Ⅲ: Is the Cur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12(12): 159 – 166.
- [41]Michale R. King. The Basel Ⅲ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and Bank Net Interest Margin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3 (11): 4144 – 4156.
- [42]陈颖,张祎.净稳定融资比率的影响因素及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基于美国商业行动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3): 37 – 47.
- [43]Angelini P. ,Clerc L. ,Cúrdia V. ,Gambacorta L. ,Gerali A. ,Locarno A. ,Motto R. ,Roeger W. ,Van den Heuvel S. ,Vlcek J. Basel Ⅲ: Long – term Impact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Fluctuations [R]. Available at SSRN 1785522 2011.
- [44]庞晓波,钱锟.货币政策、流动性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J].金融论坛 2018(1): 27 – 38 + 80.
- [45]Hackethal A. ,C. Rauch S. Steffen. Determinants of Bank Liquidity Creation Evidence from Savings Banks [R]. SSRN Working Paper 2010.
- [46]Berger A. N. ,Bouwman C. H. Bank Liquidity Creation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Crisis [R]. 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 2012.
- [47]刘文栋,王飞,翁伟斌.资本监管、流动性风险与经济周期——基于我国银行业的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6(10): 47 – 53.

(责任编辑: 张佳睿)

Research Progress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under the Basel Ⅲ

Zhang Li – ming

(Economic School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As a global unified financial supervision standard , the Basel Ⅲ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Basel Ⅲ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focuses on macro – prudential supervision , capital adequacy supervision and liquidity supervision. This paper collect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Basel Ⅲ after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 and focuses on the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in the last five years , in order to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Keywords: Basel Ⅲ; Macro – prudential Supervision; Capital adequacy Supervision; Liquidity Risk Supervision

— 136 —